

---

# 中国银行行史

## ——档案、实物、诠释方法<sup>\*</sup>

李培德

---

**内容摘要** 本文尝试以中国银行为个案，从不同角度，包括中国银行的历史档案、行史博物馆所展出的文物、已刊行的行史资料和行史等，探讨中国银行行史概念的形成和对行史的诠释方法。本文依据的是笔者于近年所搜集得来的超过四十种与中国银行行史相关的出版物，包括行史、行史资料汇编、行志、周年特刊、纪念图册、研究专著、银行家的个人传记、日记、回忆录、文集等。本文尝试指出，在不同时期推出的中国银行行史，不仅缺乏统一的标准，且于撰写和研究方法各方面，都未能与国际学术水平接轨。

**关键词** 中国银行行史 银行史 企业史 银行档案 银行史博物馆

### 一、引言

2012年，中国银行庆祝一百周岁。按照习惯，中国公司、行号都会在大庆时编纂周年史，中国银行亦不例外。不过，笔者认为，无论从动机还是内容来看，周年史都不能等同行史。

作为一种学术研究，企业史、银行史，最早兴起于欧洲，继而是美国和日本，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可谓不长，为近二十年间的事。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史备受学界关注。作为百业之母的银行业，更加惹人注目。况且，中国银行近年发展速度惊人，资产值在国际化后猛增，目前已跻身世界十大银行之列。

本文尝试以中国银行为个案，从不同角度，包括中国银行的历史档案、行史陈列馆展出的实物、已刊行的行史资料和行史等，探讨中行行史概念的形成和对行史的诠释方法。本文依据的是笔者于近年所搜集得来的约四十种与中行行史相关的出版物，包括行史、行史资料汇编、行志、周年特刊、纪念图册等。本文尝试指出，在不同时期推出的中行行史，不仅缺乏统一的标准，且于撰写和研究方法各方面，与目前的国际学术水平还有差距。

---

<sup>\*</sup> 本文曾于2010年12月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的太平洋邻里协会(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香港年会暨联合会议上发表，承蒙滨下武志、何圻基、俞肇熊、景祥祐诸位教授提供意见，谨此致谢。

## 二、周年史不是行史

编纂企业史，为企业作传，早成通例。据学者所指，日本的“社史”（指会社史，即公司史）至 2002 年止，已出 13000 种<sup>①</sup>。与日本相比，中国只有不到 1200 种，显然是落后了<sup>②</sup>。不过，中国银行作为具代表性的企业，在编纂企业史方面所下的工夫，相对于其他银行而言，可以说是佼佼者。无论从种类和数量来说，都是同行之冠。

据笔者的统计，目前中行行史的出版物，可分为以下五种：1. 正行史；2. 行史资料和行志；3. 行史图册；4. 简史及翻译本；5. 周年纪念册。从下表 1 可见，占绝大部分的行史多为地方分行史。由于中国银行分行众多，这里所列出的十种地方行史只是行史的冰山一角，不可算是行史的全部。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周年纪念册的广告性质较浓，且内容上多为纪念性的文字，不能属于正行史，依出版时序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七十五周年纪念》（香港：中国银行，1992 年）；《中国银行烟台分行 1913—1993》（烟台：中国银行烟台分行，1993 年）；《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1915—1995》（重庆：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1995 年）；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编《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服务香港八十年，1917—1997》（香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1997 年）；《中国银行沈阳分行分设二十周年纪念册》（沈阳：中国银行沈阳分行，2001 年）；金胜潮编《行史掠影——庆祝中国银行成立九十周年》（上海：中国银行上海分行，2002 年）。以上各种趁周年纪念而内部发行的特刊，与正行史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不同。

表 1 近八十年来推出的中国银行行史著述

著编者	书名	出版者	年份	页数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大事记	中国银行	1931	1 册
中国银行济南分行行史办公室编著	济南中国银行史	中国银行济南分行（内部发行）	1986	240
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北京市档案馆	北京的中国银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9	485
中国银行上海国际金融研究所行史编写组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1912—1949 年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1	249
张钢主编	中国银行，1912—1992——纪念中国银行成立八十周年（图册）	中国银行	1992	271
崔承熙	甘肃中国银行史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2	303
中国银行广州市分行十五年编译组	中国银行广州市分行十五年（1979—1993）	中国银行广州市分行	1995	600

① [日]村桥胜子：《社史の研究》，ダイヤモンド社 2002 年版，第 1 页。

② 这已是较为进取的估算，因为已包括非由企业出版的独立研究专著，参考金丸裕一：《企业经营の文化的土壤与技术移転——「中国社史目录」编纂を基础として：平成 16 年度—平成 19 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 2008 年版，第 6~24 页。

续表

著编者	书名	出版者	年份	页数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	中国银行行史, 1912—1949年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5	949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	中国银行行史简本, 1912—1949年	中国银行(内部发行)	1997	150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History of the Bank of China	A History of the Bank of China, 1912—1949(Condensed Edition) *	Sinolingua	1999	235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	中国银行行史, 1949—1992年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1	2册
中国银行运城分行行史编辑委员会	中国银行运城分行行史	中国银行运城分行行史编辑委员会	2005	44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党务工作部编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组织史(1949—200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2006	1册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史编辑委员会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史(1915—1996)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	2007	643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行史编辑委员会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行史(1938—2007)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	2008	489
《百年春秋》编辑委员会编	百年春秋(图册)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2008	159
张志勇	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史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9	333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行史编纂委员会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行史(1913—2010)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0	33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百年记忆·百年史话(图册)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012	2册

\* 这本被称为“压缩版”(Condensed edition)的英文中行行史简本, 会因翻译上的问题令英语读者难于了解。

### 三、行史标准

中国的银行界意识到利用周年纪念编印特刊, 以达到提高自我认同、整理和保存历史文献等多重目的, 最早可追溯至1930年代。早于1931年, 中国银行便自行刊印《中国银行大事记》, 记述于1911年至1931年二十年间发生的大事<sup>①</sup>。1934年, 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和香港分行同时开业, 为此特别编刊《开幕纪念册》<sup>②</sup>。1937年, 金城银行为纪念成立二十周年, 编印《二十年纪念特刊》<sup>③</sup>。因此, 由银行自行编印周年史, 早有先例。

① 金佩, 范丽选编:《中国银行自撰大事记(1911—1931年)》,《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第3~7页。

② 《广州香港交通银行开幕纪念》,交通银行香港分行1934年版。

③ 《金城银行创立二十年纪念刊》,金城银行1937年版。

包括正行史和非正式出版的周年史,到底由谁人撰写,编写的标准又是什么,成效如何等,引起了笔者的兴趣。笔者对上文表1所列的各种行史进行考证,发现几乎所有的行史编纂者都与中国银行有关,多为原来的旧职工、退休干部,在中国银行有颇长的工作经验<sup>①</sup>。从正面角度看,由“内情者”(insider)来写行史,当然可收驾轻就熟之效。不过,从反面角度看,亦难免有主观、偏颇、既得利益作祟等负面作用,因为并非所有人都具有专业撰写行史的水平,由自己职工来写,有时会弄巧成拙。笔者赞同曾经担任汇丰银行档案主任的格林(Edwin Green)所说,编写银行史应由与银行无关的独立专业人士去做,在取得银行的同意和协助下去进行编写工作<sup>②</sup>。举例来说,汇丰银行行史便是由中国金融史学者景复朗(Frank H H King)来编写,该书一套四卷,于1987年至1991年期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仍被视为权威之作<sup>③</sup>。

曾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和行长的卜明,在其文集《八十纪行》提及在晚年编写和讲授中行行史时,对行史内容、结构的个人看法:

中国银行84年的行史如何划分历史阶段,这是编史、讲史中必须首先要明确的问题。由于中国银行自成立至今一直是国家银行,它的发展受到以下三个基本条件制约:一是政权的变更转移,或重大政策的制定执行;二是国家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如爆发革命,发生战争;三是中行内部因股本消长,重大人事更迭,而使性质任务发生转折……我们讲中行的历史问题,也就是讲中行在发展中遇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政策方针与客观实际、经济运行与管理体制等等各种矛盾,矛盾克服了,亦即问题解决了,历史得到前进。建国后中行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可概括为政策、体制、法制三个方面十三个问题……(以下问题省略)。<sup>④</sup>

总括卜明以上所说,处理时间较长、牵涉方面较广的中行行史,首要的方法是“历史分期”,把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分成四期:1.1912—1928年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2.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3.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4.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同样,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也分成四期:1.1949—1952年经济恢复时期;2.1953—1966年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3.1966—1979年“文化大革命”时期;4.1979—1992年改革开放时期。这种平稳的编写取向,重视人物、事件、时代背景等,普遍出现于各种中行行史著述之中。此外,在表2开列的九种中行分行志,无一不采用上述分期方法。值得指出的是,这批行志都没有正式出版,而是作为内部刊物流传。不过由于印刷数量有限,大多鲜为人知。正如表1所示,中国金融出版社曾多次为中国银行出版

① 据王传纶所说,“编委20人,都是老银行,多年负责中国银行某方面、某部门的业务;其中不少人同时又是亲自动手的撰稿人”。见王传纶:《〈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年)读后感》,《国际金融研究》1996年第1期,第20~22页。

② Edwin Green: *Comments o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a commercial bank, in How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a Bank* (Aldershot & Vermont: Scolar Press, 1995), pp. 57~60.

③ Frank H H King: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Volume 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1991). 据说汇丰银行于2015年庆祝150周年,正积极进行第五卷(1985—2015年)的编写工作。

④ 卜明:《编讲行史》,《八十纪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278页。

行史。不过，尚未有一本列入该出版社的得奖图书名单<sup>①</sup>。无可否认，正式出版的中行行史，须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笔者认为，银行是经济机构，要了解银行的作用，最基本的方法，应从其业务入手。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早于1929年便在其所著《中华银行论》提出此一看法<sup>②</sup>。欧洲经济史学家艾瑟(Abbott P Usher)，亦有相似的观点，认为欧洲商业结构之改变，最好从掌握商业信用的金融机构银行之成长来了解。从此一角度来看，银行史等同于经济史<sup>③</sup>。

表2 近二十年来推出的中国银行行志

编著者	书名	出版者	年份	页数
中国银行南海支行编	南海县外汇银行志	中国银行南海支行	1990	83
陈大梅、林献章主编	北海中国银行志(1915—1990)	北海中国银行志编委会	1991	98
中国银行宁波分行编	中国银行宁波分行志(1914—1987)	鄞县文教印刷一厂印	1991	230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金融志编审委员会	江苏中国银行志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993	360
广西梧州中国银行	梧州中国银行志	广西新闻出版局	1993	140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行志编纂委员会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志(1975—1995)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	1995	127
王选宾主编	中国银行新昌支行行志(1985—1996)	中国银行新昌支行	1996	114
中国银行公主岭支行志编委会	中国银行公主岭支行志	中国银行公主岭支行	2003	136
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志编写组	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志(1976—2005)	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	2009	440

包括行史和行志在内的一些资料，由于编写时间不同，缺乏统一标准，因而在内容上出现偏差的现象最为常见。举例来说，中国银行的前身大清银行，据曾经参与编写中行行史的孔祥贤所说，中国银行与大清银行并无丝毫关系，中国银行的成立，无论在股本来源、筹办经费、债权债务的继承各方面，都与大清银行无关<sup>④</sup>。这一观点虽没有被所有的中行行史著述所认同，但已成为目前中国银行对自己行史的基本看法，即中国银行始于1912年，而非大清银行(最早时称户部银行)成立的1905年。换句话说，大清银行在辛亥革命前的一段历史被强硬地与中国银行分离。

有趣的是，在多种中行行史著述中，仍可见到中国银行源出于大清银行的记述。例如：

① 见“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2005年获奖图书一览表”，林铁钢主编：《金融书香——中国金融出版社50周年：1956—2006》，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123页。

② 收入《马寅初全集》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470页。

③ Abbott P Usher: *The Early History of Deposit Banking in Mediterranean Eur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3). 见刘翠溶：《艾瑟(Abbott P Usher)》，于宗先主编：《经济百科全书1：经济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84~88页。

④ 孔祥贤：《中国银行并非大清银行所改》，《财经研究》1986年第1期，第60~61页。

1912年1月24日,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呈请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以原有大清银行商股五百万两,承认为中国银行的商股,并添招商股五百万两。在商股未招足前,由政府拨出公款协助,俟收到商股后拨还。所有大清银行官股,应行“消灭”,以抵补大清银行在各地所受损失;大清银行商股之债权、债务,另设机关清理,并请政府派正、副监督会同商股股东筹备改组。当经财政部呈奉孙大总统批准,财政部呈文中叙明两点:一、就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可使不费手续,成一完全巩固之中央银行;二、承认原有商股,但使商股不受损失,借维信用于将来。同时财政部呈派吴鼎昌、薛颂瀛为中国银行正、副监督。中国银行遂于同年2月5日在上海大清银行旧址营业……<sup>①</sup>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大清银行商股股东吴鼎昌、叶揆初、宋汉章等发起成立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上书政府建议改组大清银行为中国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能。奉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谕,1912年1月24日中国银行获准成立,2月5日在上海正式开业。<sup>②</sup>

笔者认为中国银行的历史,应从其前身大清银行开始算起。道理简单,政权交接不应影响中行行史之起始。否则,1928年、1949年亦可看作为中行行史之断分。

#### 四、行史档案和行史资料汇编

回应前文提出的问题,到底撰写中行行史的标准是什么?对于卜明提出的历史分期方法,笔者虽不反对,但认为过于标准化,将无法兼顾行史内容的多面性、复杂性、相互关联性。此外,更会容易埋没一些重要问题的线索。表3所列出的九种中国行史资料汇编,可谓如出一辙,说是相当标准化的行史资料集,也不为过。一般来说,这些资料集较着重收录有关制度、典章方面的资料,虽有涉及业务,但往往偏重某一部分,欠缺全面。至于有关财务会计、广告、行员生活,又或用外文编写的资料,都一律欠奉。

表3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

编著者	书名	出版者	年份	页数
中国银行广州分行行史编写组	广东中国银行历史资料汇编(1914—1949)	中国银行广州分行行史编写组	1988	237
中国银行广州分行行史编写组	广东中国银行历史资料汇编(1949—1989)	中国银行广州分行行史编写组	1991	471
中国银行福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	中国银行福建分行史资料汇编(1914—1949)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591

<sup>①</sup> 中国银行济南分行行史办公室编著:《济南中国银行史》,中国银行济南分行1986年版,第15~16页。

<sup>②</sup> 张钢主编:《中国银行1912—1992——纪念中国银行成立八十周年》,中国银行1992年版,第42页。

续表

编著者	书名	出版者	年份	页数
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年)	档案出版社	1991	3册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北京金融志》编委会办公室编	北京金融史料第五册(中国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	1993	621
中国银行泉州市分行行史编委会编	中国银行泉州市分行组织史资料(1916—1995)	中国银行泉州市分行国际金融调研室发行	1995	202
中国银行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分行合编	中国银行东北地区行史资料汇编(1913—1948)	旅顺包装装潢印刷厂	1996	625
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汇编编委会编	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汇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	3册
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组织史(1949—2005)	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	2006	1册

需要指出，中国银行在民国时期是规模最大和分行最多的银行，为国民政府扮演过中央银行、特许外汇管理银行的重要角色，但这些特点都无法从目前出版的行史或行志中反映出来。

档案资料，可谓是编写行史的最重要依据。由于中国银行分行众多，因而全国各地包括台湾、香港都有收藏中国银行档案的可能，加上1950年时中国银行并入人民银行，因此在人民银行的档案中也有中国银行的部分。据估算，总数约四万卷，达二十亿字之多<sup>①</sup>。不过，这数字还未包括台湾档案的部分<sup>②</sup>。上面表3开列的九种中行行史资料，只可作为中国银行历史档案的其中一部分。

1992年，正当中国银行庆祝八十周年之际，中国银行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宣布合作协议，共同编纂多种行史资料，包括《中国银行历史名人传》、《中国银行行史图片集》、《中国银行股本变化史料》、《中国银行各项业务管理制度办法及具体实施情况史料》、《中国银行董监事会事务会及股东会议史料》、《中国银行组织机构变化史料》、《中国银行发行公债钞票档案史料选编》、《中国银行行员手册》等，计二百三十余万字<sup>③</sup>。可惜，事隔多年，笔者仍未见到上述资料的出版。否则，可多少弥补中国银行档案严重散失的缺憾<sup>④</sup>。

① 《中国银行的历史轨迹》，《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123页。

② 直至1971年，在台湾复业的中国银行始改称为“中国国际商业银行”，2006年又与交通银行合并，组成“中国兆丰国际商业银行”。

③ 宋庆阳：《民国时期中国银行历史档案合作抢救整理与开发项目顺利完成》，《民国档案》2002年1期，第63页。

④ 刘守华：《将中断的历史连接，让分离的档案重聚》，《中国档案》2007年第3期，第62～64页。

## 五、从实物去看行史

笔者由于多年来在大学讲授中国银行史，每到外地旅行，都会探访当地的银行博物馆。中国第一家银行博物馆上海银行博物馆于 2000 年成立，由中国工商银行营运，规模虽然不大，但“五脏俱全”。上海银行博物馆最大的特色，莫过于通过丰富的展品，把银行与人的经济生活连接起来。中国银行要解决行史资料的问题，今后不仅要重视文本文件，更需注意去收集和行史相关的实物。中国银行行史陈列馆总馆设于北京，于 2002 年成立，上海分馆设于外滩中国银行旧总行大楼地库，于 2008 年开幕。

综观上海分馆的整个行史陈列，可分为八个部分，每一部分各具特色：1. 辛亥革命前后大清银行史；2. 1916 年上海分行拒绝执行北京袁世凯政府下达的停止兑换中行钞票命令，俗称“停兑事件”；3. 坚持抗战，抵抗汪精卫政权；4. 中国银行总行建筑为避免高过毗邻的沙逊大楼，由原来 77 米降低至 70 米高的故事；5. 中国银行职员“高、洁、坚”的高尚品格与情操；6. 职工运动；7. 不同时期发行的各种钞票；8. 为社会捐献和服务<sup>①</sup>。值得指出的是，在所有实物陈列中，以钞票最受大众欢迎。有关这一点，中国银行并非孤立例子，在欧洲各地的银行博物馆都有这样的普遍做法。根据学者所指，钞票的历史，最容易帮助大众认识国家的历史<sup>②</sup>。不过，有一点始终令笔者不明白，中国银行是如何面对市场竞争，如何推广业务的？在这一方面，为何没有实物展出？

通过各种实物，包括图片、书信、文件、业务器具等等来展示行史，从严格意义上说，是解释和表达行史的一种途径，其作用与编纂行史，可谓异曲同工。不过，笔者亦参观过位于英国爱丁堡之苏格兰银行博物馆，相对于中国银行行史陈列馆，苏格兰银行博物馆的表达方法较为轻松。有几方面是值得借鉴的，例如：1. 英国虽号称民主国家，但要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女性行员；2. 苏格兰银行董事会开会，迟到的董事必须自掏腰包，缴付罚金；3. 昔日银行运送现款，为防途中被劫，银行对每一个交款细节都费煞思量，要求护送警卫每到一处必须签名作实，以防作弊；4. 苏格兰银行的警卫由于训练有素，后来成为当地的首队警察；5. 高级银行职员多从学徒做起；6. 苏格兰银行相当重视行员是具备健康的职业心理，为防止行员只懂得工作而缺乏娱乐，所谓“All work no play”，特别成立职员会和举办各种文娱活动，以减轻工作压力；7. 银行大班多借吃饭、饮酒场合来倾谈生意；8. 苏格兰的第一宗银行爆窃案，是匪徒由邻家凿墙穿入，最后被捕并被处以绞刑。笔者认为，从银行学徒、护卫、职员、大班、董事，甚至劫匪，苏格兰银行博物馆对行史的表达显然较为人性化，可以说是从人的角度去表达银行的历史，可谓更为有趣。

① 《百年春秋》编辑委员会编：《百年春秋》，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2008 年版。

② Marta Meclewska: *Exhibition of money as the best means to teach the history of the state*, in *Proceedings of the 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oney and Banking Museums*, Beijing, 2002, pp. 53~62.





据专家所指，钞票是最容易让国民认识国家历史的工具，在世界各地的银行博物馆内，都少不了钞票的陈列。图左是1935年发行的中国银行钞票，中行大楼的高度是77米，略高于毗连的沙逊大厦；图右是两年后发行的中国银行钞票，此时中行大楼的高度是70米，与沙逊大厦体齐。

## 六、小结

从1931年中国银行自行编印《中国银行大事记》起，中国银行已有将近八十年的编纂行史的传统，其间曾出现过多次政权更迭和社会运动，这一传统屡次被迫中断，造成行史数据严重散失，为日后编纂行史带来巨大困难。不过，这一问题并非无法补救。从1986年起，中国银行陆续编纂多种行史、行志、行史资料。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于不同时期推出的行史著述，均缺乏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大清银行的一段历史不应与中国银行行史割离，应为中国银行历史的一部分。

中行行史的编纂方法和标准，不能墨守成规，应随时代的需要而改变。在今日讲求企业形象和国际商誉的竞争时代，有必要去重新审视过去的行史编纂方法，特别是当这些行史、行志、行史资料已无法如实地反映中国银行的真实面貌时，我们有必要去重新建立正确的行史概念，编写具有国际水平之中行行史，我们期待《中国银行百年史》的面世。

（李培德：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